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

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徐前进 著

时间能掀开幕布，我的回忆录若传到后世，它会替我说话，人们就明白我为什么沉默。

——《忏悔录·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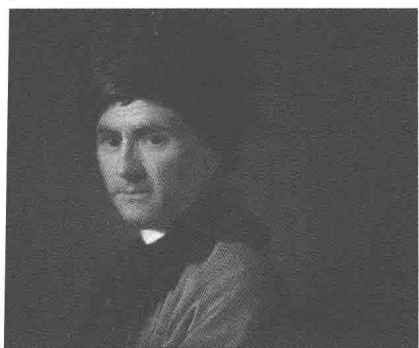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七六六年 的卢梭

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徐前进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徐前进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7-303-22279-7

I. ①一… II. ①徐…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5.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303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YIQILIULIUNIAN DE LUSUO: LUN ZHIDU YU REN DE
BIANXI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27.75

字 数：43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齐 琳 焦鹏航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人物介绍

特蕾兹(Thérèse Le Vasseur, 1721—1801): 曾是一家小旅店的佣人, 识字不多, 1745 年与卢梭相识, 之后一起生活, 1766 年年初随卢梭到英国, 1768 年结婚, 相处不融洽。1789 年后, 她为革命派敬重, 获得卢梭作品的部分稿费, 但历史档案里有对她不利的记录。

里尔丹(R.-L. de Girardin, Marquis de Vauvray, 1735—1808): 有人文精神的贵族, 世袭领地位于巴黎北郊的埃莫农维尔(Ermenonville), 他根据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建设领地, 1778 年春为卢梭提供住处, 负责他的身后事宜。革命年代, 里尔丹不同意将卢梭的棺槨移入先贤祠, 结果领地被没收, 家庭成员遭羁押, 恐怖时代后, 他沉默不语。

特罗尚(Théodore Tronchin, 1709—1781): 日内瓦医生, 在剑桥大学和莱顿大学学医, 为法国引介牛痘接种术和天花治疗新方法(以清凉法取代热疗法), 说服女士以运动保持健康, 要求母亲给孩子哺乳。1766 年担任伏尔泰和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的私人医生, 1778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8 世纪 50 年代与卢梭相识, 未治愈他的病, 卢梭斥之为江湖骗子。

小特罗尚(Louis-François Tronchin, 1743—1784): 特罗尚医生的儿子, 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 跟随亚当·斯密学习伦理学, 1766 年返乡途中在伦敦偶遇卢梭, 卢梭以为他是跟踪自己的间谍。这次不期而遇是卢梭休谟之争的直接原因, 与卢梭精神问题的发作有关。

第索(S. A. A. D. Tissot, 1728—1797): 瑞士医生, 注重实验医学, 擅长神经疾病的诊治, 著有《论神经与神经疾病》(*Traité des nerfs et de leurs maladies*)和《论文人的健康》(*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 曾任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斯(Stanislas)的私人医生。1758 年收到卢梭寄来

的《论戏剧》，一度为他治病，但疗效甚微。

普莱斯勒(A.-G. Le Bègue de Presle, 1735—1807)：法国宫廷医生，18世纪70年代与卢梭交往较多，曾到埃莫农维尔拜访，交往中觉察到他的精神问题，1778年7月3日参与卢梭遗体的解剖。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即约翰逊博士，英国文豪，生于小书商之家，幼时患病，一耳朵失聪，一眼睛失明。文风雄辩。1747—1755年，他编纂第一部《英语辞典》，曾为《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撰稿，批评公共舆论的缺陷，是英国知识界反对卢梭赴英避难的代表。

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爱丁堡人，1763年与约翰逊结识，并因《约翰逊传》蜚声文坛，1763—1765年在欧洲旅行，去科西嘉拜见独立派领袖帕斯卡尔·保利，是科西嘉共和国的支持者。1764年去瑞士拜访卢梭，1766年陪同特蕾兹赴英，之后批评卢梭性情古怪，1777—1783年任《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的专栏作家。

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国文人，古物学家，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桀骜不驯，蔑视权威。1739—1741年赴欧陆旅行，与巴黎文人界联系密切，常参与霍尔巴赫和德方(Defand)夫人的沙龙，1765年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在报刊上讽刺卢梭。

布斯比(Brooke Boothby, 1744—1824)：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人，早期浪漫派，1766年与在英避难的卢梭相识，遂成忘年之好，受卢梭风格影响，卢梭休谟之争后他为卢梭辩护，批评同胞冷漠。1776年，他到巴黎看望卢梭，卢梭托他保管《忏悔录》的部分手稿，1780年他将之译成英文出版。

达文波尔(Richard Davenport)：英国德比郡人，曾为卢梭提供免费住所。卢梭休谟之争时，作为中间人，他努力协调矛盾。因对卢梭有恩惠，1910年《卢梭研究会年鉴》刊登他的家谱。

圣皮埃尔(J.-H. B. de Saint-Pierre, 1737—1814)：法国作家，有冒险精神，青年时代受《鲁滨孙漂流记》影响到处旅行，1771年与卢梭相识，陪他散步，采集标本，目睹卢梭病情的恶化。1787年，他在《保罗与维吉妮》(*Paul et Virginie*)里对于自然的描写是浪漫主义的早期风格。

布弗莱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 1724—1800): 曾是夏尔特(Chartres)公爵夫人的侍女, 后为孔第(Conti)亲王当家庭教师, 1763年陪同法国驻英大使夫人都松(d'Usson)参与七年战争谈判。1762年经她协调, 英国驻法使馆秘书休谟帮卢梭赴英避难, 1766年卢梭休谟之争后, 她的角色变得尴尬。

乌德托夫人(Comtesse d'Houdetot, 1730—1813): 法国贵族, 1748年与乌德托伯爵(C. C. César, comte d'Houdetot)成婚, 之后与卢梭相识。卢梭在书信中称之为“苏菲”, 他们之间真挚、热烈又克制的交往是《新爱洛漪丝》的写作灵感。

埃皮奈夫人(L. F. P. T. d'Epinay, 1726—1783): 巴黎沙龙女主人, 1756年为卢梭提供住所, 1757—1759年去瑞士旅行, 因与伏尔泰的交往而被卢梭指责, 卢梭与乌德托夫人的往来又让埃皮奈夫人不满, 两人因此断交, 相互为敌。

培鲁(Pierre-Alexandre Du Peyrou, 1729—1794), 瑞士纳沙泰尔人, 有独立的品格, 关怀那些处境危急的人, 包括米拉波(Mirabeau)伯爵和布里索(Brissot), 与卢梭结识后相处融洽。待卢梭去世, 他在巴黎协助成立卢梭协会, 与日内瓦出版公司、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协商卢梭作品的出版事宜。

穆尔图(Paul Claude Moulto, 1731—1797), 生于瑞士新教家庭, 在日内瓦接受教育, 喜欢卢梭的风格, 也得到他的信任, 为之保管《忏悔录》手稿。与培鲁一样, 穆尔图对于卢梭作品的传世功不可没。

生前身后的矛盾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但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诱惑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

一个人的命运是对时代风俗的注释，这话听起来高傲，对于卢梭却不过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里有法国风俗动乱的线索。生前，他为病所困，一次次地对抗死亡与绝望，医生无从诊治，他在权力的追捕下四处逃亡，情感与理性失衡。启蒙时代有一套身体道德体系，它是无形

的，但无处不在。一个人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①，并成为其中响当当的人物，首先要经过这套道德体系的审查，卢梭因为与性病相似的身体问题而为之否定；其次要依赖优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难时，卢梭与同侪的矛盾爆发了，报刊舆论以讹传讹，使其进退维谷。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心境不同于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评判是非，之后寄希望于后代人，写作风格由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过渡。

卢梭的变形记从此开始。1766—1778年，公共视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有人迷恋他的雄辩文辞与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疯癫无常、愤世嫉俗(再生的第欧根尼)，有人说他谦和有礼、有天真的孩子气，有人说他高傲世故、善于伪装。从他1778年去世到法国革命是卢梭形象最复杂的时期，源于生命体验的身体话语有了殉道的意义，但也是为人奚落的根据。1778年卢梭去世后的四年里，他是公共舆论里浮动的幻象，一个在困苦中寻求美德的圣贤，同时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1782—1789年《忏悔录》出版后，卢梭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心理进入了公共空间，他的心理中有坦诚，也有卑琐。1789—17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极端，成为一个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识形态。1794年恐怖时代结束，他又回归历史领域，那时的人厌倦了革命的修辞术，要发现真实的卢梭，却难免偏颇的道德审判。

法国人打碎旧制度之际流行的是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寻找新生、与故往决裂的诉求。但政治动荡无从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人心越乱，变革的愿望越强烈，卢梭的形象越偏离生命意义。生前他是孤独者，戚戚无所依，革命时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领袖，革命后，各类政治意识(民主、自由、平等、专制)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政治现代化的方案，却难以形成有实践力的共识，他的形象所以多变：美德之士、自然之子、

① “文学共和国”是文艺复兴时代在欧洲新生的精神国度，1684—1718年，先后由培尔(Pierre Bayle)、拉洛克(Daniel de Larroque)、博兰(Jean Barrin)和勒克莱(Jean Le Clerc)主编《文学共和国新闻报》(*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这一称谓遂广为传播。18世纪，法国文人普遍将具有批判性和倡导科学艺术的语言空间称作“文学共和国”，并自视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即现代所谓的法国启蒙哲学家。

无耻的疯子、有理性的疯子，心理病态、神经官能症、或源于尿道炎的智力障碍，狂热的个体主义者、专断的社会主义者、不安分的外国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法兰西传统的背叛者，不一而足。这是原告缺席的审判，卢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无罪辩护，由此成就了单向度解释学的风格。

法国革命时代，单向度解释学的语法结构是“卢梭认为……”或“卢梭说……”表面上这是一套夺人耳目的革命话语，实践中却有曲解。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也不能到场申辩。所以，生命意义上的卢梭在这套解释学里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一个停不下来的变形者。若不突破革命话语的控制力，一个观点就此而来：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是一回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梭研究的背景不同于以往，在现代性批判的潮流中，启蒙时代的冷漠与利己主义为人揭露，理性、乐观、进步、求真不再是法国启蒙精神的指代。犹太人和法国人的质疑最激烈，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 Adorno)将启蒙后的世界看作“巨型的监狱”，福柯严厉批评理性与权力的隐秘关系，“启蒙的每个进步也许是迈向黑暗的又一步”。此时，卢梭的意义在于，他为什么批判现代文明？现代性批判将怒气抛向启蒙，但它是否考虑过：与旧观念相比，启蒙如何革新了法国旧制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启蒙风格不同，卢梭在多大意义上能代表启蒙的普遍精神？

在西方现代思想界，世界战争的精神创伤已趋愈合，动荡的心归于沉寂，个体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确定，关于制度与风俗的争论平息，那些曾在新旧变革之际引领风潮的智慧之光在黯淡，卢梭问题回归学术史传统，他的力量在削弱，更多的是一个学术符号。这是不是说他的意义更多是在变革旧制度的时代，最迫切的研究欲求来自动荡时代人与制度的关系，或个体的身份焦虑？卢梭研究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以生命体验塑造了时代精神，又为之塑造，所以一个人谈论卢梭时，他谈论更多的可能是法国的时代精神。

对于卢梭历史形象里的矛盾，启蒙时代的人际纷争和革命时代的观念冲突是外部视野，触不到人的心理。公共交往、作品理念、政治影响等可用于分析多数思想家，不足以确定卢梭的身份。卢梭创造了一个身

体话语体系，包括对病痛的夸张解读、渴望反抗却不得门路的愤怒，以及个体愤怒与现代性批判的隐秘关系。这套话语是感性的风格，来自于他的生存体验。他最初是在巴黎谋生的文学青年，一个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或法国强势文化意识下的日内瓦公民，这是他的公共身份；而在私人空间，他是处境艰难的病人，对天气变化敏感，无力抚养孩子，夫妻不和睦。尘世中无依靠，他就游荡于现代精神与古典美德、上帝垂恩与自我救赎之间，一个与时代精神若即若离的人，模糊的身份使之觉察到风俗的晦暗，于是愤怒地批判，当时的人却斥之为败德者。道德审判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怀疑的目光不断消解着坦白的意图，说什么都没人相信。迫于无奈，他不再对同代人诉说，也不再向上帝悔罪，他要寻求后代人的评判，天堂与地狱的语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历史意识。卢梭由启蒙哲学家向浪漫派的转变有法国文学共和国的败落之象。

卢梭的变形又在于他的性情，言行前后不一，观念因时而变，不具备与年龄相符的渐进性。1750年前，他创作戏剧诗歌，文辞优雅、情感真挚，认同科学的价值，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却成了科学艺术的批判者。他和特蕾兹育有五个孩子，都被送往育婴院，但他在文字里关怀儿童成长，对待身边的小孩和蔼可亲。青年卢梭渴望文学共和国的名利，1766年后却拒绝公共交往。对于医生，他恨之入骨，却时常研究医学，种植药用植物，并与医生往来不断。同代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后代人的解读聚讼纷纭，自启蒙运动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政治辩论与思想对抗中，他的形象变幻不定，批评与赞扬之间有难以化解的障碍，理智上不能，情感上也不能。卢梭问题最需要澄清时，研究语境混乱，学术政治化，而有足够的研究基础后，党派之争平息，卢梭已远离争端。对于外国人，这是开拓的机会，以旁观的视野追踪卢梭的历史命运和法国革命暴力的起源，从中发现社会动荡与人心惶恐的因果关系，这是历史批判的目标。

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

自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

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研究界在卢梭问题上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

西方卢梭研究素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批判。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

卢梭在英国一度很受欢迎，读者对之既好奇，又喜爱，还有几分同情，但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后，他们的看法转向负面。这场争论因何而起，与现代早期舆论的缺陷有没有关系？法国革命时代，这场争论为什么被视为英国人贬低法国的阴谋？逃亡路上，境遇艰难，身心问题如何影响了《忏悔录》的写作？1766年对于卢梭是终点，又是起点，之前的经历汇集于此，被他的情感引爆，他的新生开始了。所以，本书定题为“一七六六年的卢梭”，关乎一个人生前身后的命运，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的风俗画，又是法国现代政治意识走向混乱的序曲。

以一年旧事解释法国的制度、风俗与人心，会不会过于牵强？1766年是平凡的一年，不像1789年或1939年那样已经成为历史的路标。那一年，社会运行如常，新思想与旧制度对抗加剧，但没有震撼人心的变故。欧洲正处在小冰川期，冬季寒冷多雪，交通时常受阻，仰赖车马的邮政系统不能稳定地传递信息，文学共和国的机制时而紊乱。《法国信使

报》(*Mercure de France*)的风格仍在君权、教权与现代思想间盘桓，那一年，它发表了一篇宗教界不喜欢的文章《关于精神的准确性》，法兰西学院发起年度诗歌竞赛，皇家外科医学院公布评奖启事，鲁昂科学院公示去年的获奖名单，包括数学奖、解剖学奖、植物学奖、外科医学奖，第戎科学院坚持它的风格，又在该报刊登反科学的文章，但人工排版难免会有疏漏，6 会印成 9。

1766 年，文学共和国的事业在进展。三年前，伏尔泰借助舆论为卡拉(Jean Calas)平反后，名声大噪，此时到瑞士费尔奈(Ferney)拜访“哲学王”的人络绎不绝，最严苛的评判家也对之礼让三分；里尔丹侯爵根据启蒙理念建设他的领地埃莫农维尔，是欧洲青年旅行的一站；科西嘉的领袖保利(P. Paoli)推行教育改革与共和理念，多少影响了青年拿破仑；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历尽周折，1765 年出版《百科全书》(十七卷)，最终确立了现代理性的风格，此时，他们忙于收集读者的意见，并准备编辑一部工艺图谱。同年，爱尔维修(Helvétius)夫人在巴黎筹建了“科学共济会”，它是致力于科学事业的“九姐妹共济会”(Les Neuf Soeurs)的前身；亚当·斯密陪同布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游历欧洲，1766 年在巴黎停驻，参与重农学派的沙龙，他的法语不好，但获悉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后用之于《国富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历史一如往常，在稳定的变化里没有转折、破碎或重生，但这一年对于卢梭的意义不同，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在他看来差异明显。1750 年 8 月，《法国信使报》报道《论科学与艺术》获奖的消息，他得以进入文学共和国，在这个嘈杂的舆论空间里混了十多年后，他力不能支。1766 年是卢梭生命中最艰苦的一年，争吵、逃亡、病痛，内心深处的压抑感爆发了，不是赤裸裸的报复，而是以精神问题的形式，自我伤害。此后他要逃离文学共和国，写作风格上从启蒙者转向浪漫派，之前注重理性分析，之后强调人的感受。在工业化进程里，古典时代的静穆不见了，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退却，羊毛、亚麻、棉花、煤炭的产量每十几年就成倍增长，人口向工厂聚集，服从于机器的节奏。早期工人未经启蒙就被卷入生产制度，与机器接触的身体(手、脚和嘴唇)有了现代含义，他们的心

里有新奇，也有迷茫，有人克服了迷茫，而更多的人在迷茫中老去。制度之恶无处不在，打不破，脱不开，人人向往美，但人人有可能作恶。在这样的时代，卢梭的晚年风格为人推崇。

现代学术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因果关系，但卢梭的后期作品里更多的是模糊的感受，那是一套关于喜怒哀乐的因果关系。18世纪中期，古典主义风格向现代风格过渡，现代人格相互对立，公共交往多有冲突，卢梭在贫困、孤独与病痛中对此体会更深切，他的感性修辞是时代精神动荡的征象。鉴于此，本书不排斥对卢梭的情感化解读，如实归纳18世纪的人认为是准确的、而事实上是冲动的观念。这些缺少认同、充满敌意的精神映像是阅读文本的即时反应，未及有影响就消失了，不值得深入分析，但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历史处境就包含在这些偶然性里。

卢梭思想的意义兼具民族性和普世性，有过旧制度生存经验的人会从其中发现一些相似性，但前提是默认观念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转换。这样的转换简单易行，却可能是现代学术的陷阱，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研究者会混淆观念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忽视一个观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然后以修辞术营造让人身临其境的剧场效应，尽管逻辑严密，却是空中楼阁。

目 录

第一章 卢梭的病——生命意义的卢梭	1
第一节 不能回避的问题	2
第二节 急性间歇紫质症	8
第三节 补证与佐证	25
第四节 被害妄想症	33
第五节 理解卢梭	41
第二章 1766 年卢梭休谟之争——启蒙时代公共舆论的缺陷	70
第一节 事件始末	71
第二节 天气、舆论与卢梭休谟之争	92
第三节 卢梭休谟之争与英法的卢梭形象	100
第四节 《忏悔录》的写作：情境与意图	109
第三章 卢梭与文学共和国——启蒙兴衰与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132
第一节 文学共和国的结构	133
第二节 文学共和国的主题	137
第三节 文学共和国的精神	169
第四节 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	182
第五节 1766 年卢梭的转变——从启蒙者到浪漫派	201
第六节 文学共和国的解体——革命暴力起源以及哈贝马斯的 理论	216
第七节 萨德问题	253
第四章 法国革命时代的卢梭形象——政治意义的卢梭	277
第一节 卢梭进入革命话语体系的前奏	278
第二节 1778—1782 年：模糊的理解	300

第三节	1782—1789 年：阅读潮流与道德争论	309
第四节	1789—1794 年：夸张的神化与愤怒的沉默	318
第五节	1794—1799 年：反击与妥协	332
第六节	卢梭与日内瓦：身后的荣耀	340
结 论	卢梭变形记	346
附 录	《卢梭通信全集》中的身体话语	377
参考文献		407
后 记		426

第一章 卢梭的病

——生命意义的卢梭

卢梭是西方思想里的变形体，每当历史动荡时他就会出现在：18世纪的哲学辩论、法国革命、1820年君权复辟时代、1848年革命、1878年卢梭去世一百年、1912年卢梭两百年诞辰、法西斯极权时代。^①他是启蒙者、平等派、浪漫派、保守思想家、个人主义者、革命精神之父、民主暴力的导师。这是现代历史上的卢梭形象，无常的变化源于时代政治状况的不同，而在历史档案的深处有生命意义的卢梭形象——一个在病痛、贫困、误解里与命运抗争的孤独者。他创造了独特的身体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可追溯到《新爱洛漪丝》，1766年前后卢梭因病情恶化而将这套话语体系最终完善。这套话语体系的内涵是变化的，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宗教道德、世俗伦理、科学理性、革命意识形态、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

卢梭的病痛之苦常被人误解，法国人格里姆、狄德罗、埃皮奈夫人，英国人约翰逊、亚当·斯密、沃波尔，以及日内瓦医生特罗尚都说他是江湖骗子、愚妄之人。1778年，报刊舆论推测卢梭去世的原因，《伯尔尼杂志》(*Gazette de Berne*)、《瑞士新报》(*Nouveau journal helvétique*)归咎于肾绞痛，《百科全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秘密通信报》(*Correspondance secrète*)推测是脑血栓引起的中风。^②在街谈巷议里，

① A. Schinz, *Etat présent des travaux sur J.-J. Rousseau*,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1941, pp. 3-104.

② R. Trousson, *J.-J. Rousseau jugé par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H. Champion, 2000, pp. 471-472.

他的死因愈发离奇，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下毒。^① 革命时代，卢梭生前的病痛之苦成了殉道者的象征，他转而又成为革命精神之父。而工业时代的浪漫派注意的是卢梭身体话语里的情感困境，视之为艺术化的忧郁气质，由此成就了现代文学界的“浪漫病”。^② 在学术界，卢梭问题长久以来聚讼纷纭，同情者以身体病痛为之辩护，维护一个思想家的尊严，或是保卫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传统；批判者却以错乱的精神贬低他，质疑其思想的统一，言外之意是一个矛盾的人怎么能是现代历史的主角？双方相持不下，情感不时走向极端，或夸张地赞誉，或恶意地批评，这是19世纪法国的思想景观。1912年卢梭两百周年诞辰以来，尤其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研究者的态度有所转变，即使不是同情，至少要寻求公正。

第一节 不能回避的问题

1763年1月底，为躲避教会追捕，卢梭逃亡到瑞士汝拉山麓的莫第埃(Môtiers-Travers)，一个人烟不多的小村子，期间他的病痛又发作了，不能写信，难以招待来访的客人，只能卧床休息。^③ 这次发作比以往严重，他觉得生命将尽，遂留下遗嘱：

这个怪病折磨了我多年，它与同类型的病不同，待我死后，请医生解剖病灶，确定问题所在，为方便手术进行，我附上病情描述：
二十年来，我一直患有尿潴留症，童年时发作过。我将病因归于

① O. de Corancez, *De J. J. Rousseau, Extrait du Journal de Paris des N° 251, 256, 258, 259, 260, 261, de l'an VI*, se vend à Paris, au bureau du *Journal de Paris*, N° 14, 1797, pp. 59, 62; R. A. Leigh, "La mort de J.-J. Rousseau, image d'Épinal et roman policier,"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No. 2/3, 1778-1978, pp. 188, 194.

② F. Cummings, "Boothby, 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 Malad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10, No. 789 (Dec., 1968), p. 663.

③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t d'Ars, 7 décembre 1762,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J. Rousseau (CCJJR)*, Tome XIV, Oxford, 1977, p. 165; Rousseau à M.-M. Rey, 8 janvier 1763, *CCJJR*, Tome XV, p. 16.